



网络文化与网络社会丛书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Studies

信息科学视域 与文学研究转型

王轻鸿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信息科学领域 与文学研究系列

丁世明 著



网络文化与网络社会丛书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Studies

信息科学视域 与文学研究转型

王轻鸿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息科学视域与文学研究转型/王轻鸿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308-13656-3

I. ①信… II. ①王… III. ①信息学—关系—文学研
究 IV. ①G201 ②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9810 号

信息科学视域与文学研究转型

王轻鸿 著

责任编辑 赵 静 张 琛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金旭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50 千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656-3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C 目 录

Contents ■ ■ ■

绪 论 文学研究中科学视域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反思	1
第一节 文学研究转型的科学语境	1
第二节 走出“科学主义”的误区	15
第三节 重审文学研究中的科学话语	28
第一章 信息科学视域与文学本质新论	44
第一节 文学本质的探求方式	44
第二节 信息科学视域中的文学性观念转型	60
第三节 “文学终结论”的科学意蕴	68
第四节 米勒“文学终结论”的科学语境	78
第五节 信息时代文学虚构论的重构	86
第六节 审美意识形态论科学因素的解析	101
第二章 信息科学视域与文学批评范式转换	110
第一节 信息转向与文化研究的兴起	110

第二节	信息科学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121
第三节	信息科学与生态批评的意识形态	130
第四节	信息时代的乡土文学批评	142
第三章	信息科学视域与文学史思想变革	150
第一节	科学系统观念与文学史思想的建构	150
第二节	复杂性系统观念与文学史思想的困境	158
第三节	探索复杂性:文学史思想之再生	164
第四章	信息科学视域与文学研究的民族性探索	170
第一节	信息科学与东方神韵	170
第二节	信息时代语言学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	181
第三节	“诗可以兴”重释	190
第四节	关于文艺学转型论的解析	199
第五节	西方文学性观念接受过程中的价值倾斜	207
第六节	走向融合创新的文论阐释	218
第五章	信息时代“新理性精神”的重铸	225
第一节	“新理性精神”的科学维度	225
第二节	理性的穿越——乡土中国形象的现代性形态	234
第三节	略论新时期作家对知识分子的表现	243
第四节	浪漫之再生	249
第五节	关于当前现实主义的价值评判	257
第六节	雅俗合流的文学趋向	265
参考文献		271
索 引		288
后 记		291

文学研究中科学视域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反思

第一节 文学研究转型的科学语境

影响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生产力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而“赛先生”就像一位巨人,在推动着生产力的不断革新,促进了社会的结构、性质和形态的演化。

翻开人类社会发展史,“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关于早期的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就已经直观地告诉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转型有密切的关联。当然,科学技术在农业文明时代水平不高且发展缓慢,对于社会的影响还是比较微弱的。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开启了继农业文明之后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特别是方兴未艾的信息革命,更是以席卷全球的磅礴气势,推动着社会的急剧转型。

动力、机械等科学技术的问世,带来了近代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工业文明由此诞生。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H. 巴特菲尔德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着重探讨了科学革命的重要影响,在他看来,比起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些因素,科学变革是更为重要的决定“近代社会特征的划时代事件”。^① 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19 世纪的最后 30 年,经济迅速腾飞,这期间,世界工业总产值增加了两倍多,其中决定当时经济发展命脉的钢铁和石油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前者产量猛增 55 倍,后者产量增加 25 倍,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科学

^① H. 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张丽萍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7—159 页。



技术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价 18 世纪的产业革命的时候就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显现出了“物化的知识的力量”，显示了人的本质力量，“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的力量”^①。正是看到了科学对于当时社会的巨大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都反复阐述了“科学是生产力”的观点。

20 世纪中叶以来，以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及普遍应用为标志的信息技术，在欧美发达国家率先兴起，迅速掀起了一股信息革命的浪潮。信息时代的科学知识量远远超过了工业文明时代，据有关资料显示，迄今为止，人类知识总量的 3/4 是 20 世纪中叶以来创造的。在 19 世纪，人类知识量大约每隔 50 年增加一倍。在 20 世纪，则每 10 年增加一倍。而到了当代，知识增长、更新的幅度明显加快、加大。到了 70 年代，每 5 年增加一倍，80 年代，每 3 年增加一倍。科学不断升温，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最有力的支柱，据统计，自 18 世纪以来，世界工业的增长率以 1951—1976 年间增长速度为最快，达到年均 6.4%。20 世纪初，在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其科技进步因素所占比重仅为 5%~10%；而到 50—60 年代，其比重上升为 50% 左右；到 80 年代以后，则高达 60%~80%。^②

信息科学技术革故鼎新，如同催化剂一样催生了新文明的衍生，科技所创造的成果广泛地扩散到社会系统中，成为新文明的必要基础。在最发达的美国，信息科学技术在 20 世纪的 50 年代就已经发展起来，就在美国经济萧条快要跌入低谷的时候，在波士顿、加利福尼亚等地区的“硅谷”却异军突起，到了 80 年代初期，销售额达到了一千多亿美元，成为了仅次于钢铁、汽车、化工之后的第四大工业，创造了使得美国走出困境的奇迹。^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2 页。

② 参阅嵇立群：《文明的支点：科技发展与世界现代化进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阿尔弗雷德·D. 钱德勒和詹姆斯·W. 科塔达主编的《信息改变了美国——国家转型的力量》一书，讲述了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信息科技而发生的一系列传奇故事，意在说明，美国当今的经济活动大部分都与信息的创造、传输有关。

中国在新时期之初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8年3月18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会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用诗化的语言发出了这样的呼唤:“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中国的信息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萌芽,90年代正式启动,高起点大投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加大投资力度,重点建设了信息服务系统,建设了公用数据传输网和国家卫星通信系统,特别是“863”计划,直接将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确定为优先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1993年开始,逐步实现了跨国的计算机联网,建立了公用信息平台,为政府管理以及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各个方面的信息交换和共享,提供了技术支持和物质条件。1997年,全国第一次信息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国家信息化体系”的概念。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指出“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2002年,原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编制的《国家“十五”信息化重点专项规划》,对于“国家信息化”这个概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将之看作是由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网络、信息产业、信息人才、法规、政策、标准构成的综合体系。从1987年9月向世界发出“跨越长城、走向世界”的第一封电子邮件起,20多年来,中国互联网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截至2010年3月底,中国网民人数已达到4.0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9%,后来者居上,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成为了互联网上的“第一人口大国”。

信息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变革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前所未有的。19世纪中叶,牛顿力学和电磁学等科学在工业上成功运用,马克思了解这些最新的科学成果,并从深切的具体体验出发,指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力。1856年4月14日,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蒸汽机、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彰显了科学技术浓厚的社会意义。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



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①中国在“五四”时期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将之看作富国强兵的重要法宝,加速了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进程。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生产功能的思想,他将科学技术看作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认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一定要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②。马克思和毛泽东等极其重视科学技术,但是没有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是有复杂的历史的原因,主要与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关系。新时期以来,信息科学技术在社会转型升级中的地位更加凸显了出来,邓小平在新时期高瞻远瞩,紧扣时代脉搏,系统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等思想,并且在1988年9月5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深刻洞见。如今,科学事业不断繁荣昌盛,“科教兴国”、“科学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治国方略。

信息科学技术将会引发的社会的一系列变革,学术界已经予以了充分的关注。阿尔温·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丹尼尔·贝尔等学者都是立足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展望未来社会,认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他们对于这个崭新的时代有不同的命名,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命名都与信息科学技术相关,突出了信息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于1959年第一次提出“后工业社会”概念。1972年全美知识精英评选时,他以最高票数名列20位影响最大的学者之首。他于1973年撰写的《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一书,系统阐述了工业社会的未来,认为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在各种职业中将占主要部分,将出现以科技为基础的新工业,即“理论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已经成为后工业社会革新的主要力量。他在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对于后工业社会做了更进一步的阐述,认为后工业社会主要强调信息的作用,虽然并不取代工业社会,甚至不能取代农业社会,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抹杀其中的差异。他举例说,食物自古以来都是人类的必需品,到了工业社会,有了化肥就可以提高产量了,而到了后工业社会则又发生了变化,资料和信息的管理成为了这个复杂社会不可缺少的工具了。^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4—57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③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52页。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 1982 年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将信息革命看作是“大趋势”。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美国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夹缝时期，其发展方向有 10 个，其中第一个就是“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变”。书中列举了微电子技术、遗传工程、光导纤维、新能源技术等，已经广泛运用，引起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该书还进一步指出，随着电子信息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变迁将会迅速加剧。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后来他又以《亚洲大趋势》、《中国大趋势》再次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中，站在全球化、信息化的高度，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他的这些学术研究成果拉近了和中国读者的距离。

记者出身的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 1980 年撰写了《第三次浪潮》，将信息革命命名为“第三次浪潮”。他把人类文明分作是三个阶段：第一次浪潮即农业文明，发生在距今 8000 年到 10000 年前，人类从野蛮的渔猎时代进入到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第二次浪潮即工业文明，是从 300 年前开始的；第三次浪潮即信息文明，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托夫勒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信息社会的概念之后，在后来的著述中又进行了反复的阐述。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他详细分析了知识在权力三要素即暴力、财富和知识中的核心地位，首先认为权力是一种有目的的支配他人的力量，然后指出权力以知识为基础，知识就是财富，知识作为一种符号财富，不断在升值，用之不竭，整个知识系统或者说高科技世界的“信息层”正在进行重组和综合。^① 1995 年在其新作《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中，更明确地论述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社会的内涵，直接宣称，“有一件事情是明白无误的：电子通道构成了第三次浪潮经济的基础设施。”^②

新时期之初，《第三次浪潮》被译介到中国，当初只是印了 3000 册，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主要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展开的。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仅仅立足科学技术而忽略了生产关系，无疑掩盖了一些社会矛盾，因此认为，这种单一视角的考察对于社会形态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本著作从科学层面对于社会的解析，打开了一扇考察社会变革的新的窗子，视角新颖别开生面，颇有启发意义。也正是因为这样，这本书很快就在读者的心灵中造成了剧烈的冲击，一下子印了几百万册，托夫勒也因此

① 托夫勒：《权力的转移》，刘江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43 页。

② 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陈峰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37 页。



被中国某主流媒体评为“影响近现代中国的 50 个外国人”之一。

二

科学作为第一生产力,在物质生产方面发挥出了巨大的功能,容易形成广泛的共识。然而,仅仅从物质的、功利的层面来理解信息科学的价值意义是不够全面的。

科学对于人的精神、心理等文化层面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被誉为“科学史之父”的萨顿指出:“科学不仅是改变物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改变精神世界最强大的力量,事实上它是如此强大而有力,以至于成为革命性的力量。随着我们对世界和我们自己认识的不断深化,我们的世界观也在改变。我们达到的高度越高,我们的眼界也就越宽广。它无疑是人类经验中所出现的一种最重大的改变;文明史应该以此为焦点。”^①默顿特别强调科学对于文化的影响,甚至这样说:“功利主义应该是一种科学可以接受的副产品而不是科学的主要目的。因为一旦有用性变成科学成就的唯一标准,具有科学重要性的大量问题就不再受到重用了。”^②这些论述都凸显了科学的人文意义。

其实,“人文科学”名称本身就表示人文与科学不是天敌。这是个外来语,从词源上看,出自拉丁文 humanitas,原指的是以人和自然为对象的世俗学问,与神学研究相对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获得发展和独立之前,人文学科作为总称,本身就包含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其中就包括数学技艺、语言艺术,也包括某些科学、历史学和哲学等。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作为一种完整的知识体系相互渗透,共同担当起促使人全面发展的重任。18 世纪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科学”,与人文精神是不可分离的,主要以人的自由、自律、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为目的。

将科学与人文对立起来,只是近代以来出现的现象。主要原因是,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基础就是分门别类,强调各门学科的独立研究,形成的是典型的机械论科学观,于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分别属于不同的阵营,两者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同时,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模式,是在极力追求经济的发展速度,其不良的社会后果日益显现了出来,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带

① 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刘兵等译,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0 页。

② 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范岱年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349 页。



来的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等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瓶颈,受到了人文学界的批判和抨击,从而阻滞了科学与文化之间的通道。有感于这种现状,爱因斯坦在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的讲话中,就曾以一种训诫的口吻特别强调:“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标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①

就中国而言,是在近代引进西方科学的,要达到的是“学夷”以“制夷”、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目的,形成了更为激进的科学功利性的思维模式,淡化了科学的人文色彩和人文学科的科学意味。就像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国人所谓的启蒙呢,也是恰好搞反了,把科学首先当作‘富强’的工具,即把科学完全工具化。李泽厚所说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指的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启蒙’,并没有人先在义理层面对欧洲的启蒙思想进行理性的论证,所以不可能有真正的在‘未经审思过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意义上的启蒙。在这样的视角下,把启蒙仅与工具理性相联系,也就看不到本来意义上的价值理性意义上的启蒙理性了。这样,中国近代史上的风风雨雨,就要另作别解了。”^②

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本是同根生”,是可以相互沟通和阐释的,“相煎太急”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那么,有没有可能破镜重圆、重归于好呢?

早在 100 多年前,马克思就曾经说过:“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做准备的发展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③马克思运用发展的眼光看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结合的趋势,以及科学知识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巨大影响力。这种见解是十分精辟的,这种预见如今已经得到了印证。

人类学在 19 世纪 70 年代兴起,出现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的迹象,试图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人类的文化现象来研究,将之纳入与宗教、艺

① 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 3 卷,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310 页。

② 翟振明:《百年启蒙中的几个重大偏差》,《南方周末》2007 年 7 月 26 日。

③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0 页。



术、习俗等文化现象并列的文化形式之中。20 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掀起了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导致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根本变迁,促进了人本性所要遵循的根本宗旨。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历史主义学派,特别强调科学是一种社会事业,是社会行为,“科学尽管是由个人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却是集团产物,如不考虑创造这种知识的集团特殊性,那就既无法理解科学知识的特有效能,也无法理解它的发展方式”^①。研究科学、技术、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期成为了一门新兴的学科,英文名称为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缩写为 STS,这种科学观强调联系、系统、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观点进行研究,试图实现最大的跨学科、多学科和综合学科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整体论意义上的科学观。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即 SSK,主要研究科学的社会意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较有影响的学者有布鲁诺·拉图尔、塞蒂纳、马尔凯、巴恩斯等,其主要观点被概括为“建构主义”,具体来说就是,“科学知识跟其他知识形态并无本质的区别。”^②

科学知识融合的状况,在学科设置中也显现了出来。据有关资料显示,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为止,科学已经发展成为由约 5000 多门学科组成的大系统,其中交叉学科总数达 2581 门,文理交叉学科达 295 门,虽然文理学科所占的比例尚小,但是它们是在大门类科学之间,即远距离、大跨度科学之间的交叉,因而在科学发展中是有着重要意义的。^③ 在跨度大的门类交叉学科中,有些自然科学如生命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在数量上占据了很大的部分,占到总数的 53.62%。这表明,自然科学的触角在向社会科学延伸时,在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关系最为密切的生命科学中,较早地获得了感应和反馈。

这也启发我们从新的视角去重新阐释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历史。法国当代哲学家利奥塔认为:“资讯革命为社会学、文化学带来了新的视角:从资讯或知识发展的观念,来重新阐释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④所谓“资讯革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信息革命。

① 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Ⅺ页。

② 迈克尔·马尔凯:《科学与知识社会学》,林聚任等译,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译者前言”第 2 页。

③ 吴维民主编:《科学的整体化趋势》,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61 页。

④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20 页。

信息科学在建立之初,只是局限在自然科学技术领域扩展。以 20 世纪 40 年代申农的《通讯的数学理论》的问世为标志,他曾经说:“信息论(狭义)的基本结果,都是针对某些非常特殊的问题的。它们未必切合像心理学、经济学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领域。”^①据统计,到了 80 年代与信息相关的学科达到了 30 多个,到了 90 年代则达到了 50 多个,而以信息为基础的学科如雨后春笋一样产生。各门信息学运用计算机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交叉的学科。比如,90 年代兴起的量子信息学,就是坚持认为量子无非就是信息,或者将量子理解为信息更为方便、简洁;所谓生物信息学,则是基于信息的特征来定义和理解生命现象。

信息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超出自然科学的阈限,寻求更大范围的结合。普利高津在《从混沌到有序》中引述了薛定谔的话,主要就是批评那种看不到科学同总的人类文化相联系的观点,薛定谔是这样说的:“有一种倾向,忘记了整个科学是与总的人类文化紧密相连的,忘记了科学发现,哪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深奥的和难以掌握地发现,离开了它们在文化中的前因后果也是毫无意义的。”^②如今,从信息科学的角度来考察社会问题,已经被广泛应用,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出现,即为信息主义。信息主义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本来是用来描述当代科学的技术特点的,后来用来解释社会特点,解释世界,正在从一种纯粹的科学观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观、文化观。

按照信息科学的观点,我们当今所处的信息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是由大量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属性的子系统或基本要素构成的,在系统内部存在一定的运行规则,同时,每个子系统或者要素在一定外部条件和环境的影响下,运行的轨迹也会发生变化,这样的一种内部和外部的相互关联,形成了整体性的结构,或者说就是系统。这种科学观念成为当今时代理解社会的一种理路,比如,钱学森提出航天系统工程理论以后,又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进一步拓展,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角度,论述了社会系统的基本特征。钱学森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基本形态,都要包括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三种形态,进而提出社会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意识系统三个组成部分,与之

① 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金吾伦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 页。

② 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3 页。



相对应的是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形态)、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三种文明建设。信息网络是个复杂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促使这三种文明建设结合,共同构成了社会系统工程。^①

三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信息科学的兴起,对于文学研究的转型而言,意义何在?

关于文学研究的转型,一直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往往从现代、后现代文化的角度来阐释,已经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对于我们理解、分析文化、文学现象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意义的。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阐释也留下了一些罅隙。

首先,现代、后现代主义无法建立起自洽、自足的理论话语。

现代派的开拓者之一、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就曾经对于现代性作过这样的经典解释:“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出永恒”。即现代性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针对不同的传统就有不同的现代性。而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更是闪烁迷离。关于后现代的起源,艾布拉姆斯认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詹明信则追溯到了20世纪50年代,佛克马认为是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还有的甚至将浪漫主义当作后现代主义的源头,追溯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哈桑干脆提出,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日期是不确定的。西方现代主义研究专家、荷兰学者汉斯·伯顿斯将后现代主义从1934年到70年代末划分为四个时期,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定义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因此,甚至建议每隔五年调整一次。波林·罗斯诺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怀疑、否定思维,使得知识体系碎片化,导致了虚无主义,因此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即要想真的能够讨论后现代主义的话,那么就有必要针对各不相同的、甚至矛盾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各种阐述,区分出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倾向。^②有学者对后现代主义作了更全面细致的“谱系学”考察,指出后现代主义在表现形态上有解构主义、反基础主义、视角主义、后人道主义、非理性主义、非中心化等11种思潮。^③现代、后现代现象之繁复可见一斑,真可谓琳琅满目让人眼

① 钱学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人民论坛》1992年第10期。

② 参阅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参阅王治河:《后现代主义辞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花缭乱。既然现代、后现代话语的意义处于游离、流浪的状态,那么,也就无法建构起令人信服的文学理论体系。

现代、后现代话语在西方学界也早已遭受诟病。后现代主义是作为现代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其反叛的意味是十分浓厚的,詹明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概括为:“表面、缺乏内涵、无深度”,“这可以说是一切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最基本的特征。”^①费瑟斯通说:“后现代主义那种新的平淡,换个说法,就是一种缺乏深度的浅薄。”^②如此说来,运用现代、后现代来研究文学,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削弱了文学研究的根基。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现代、后现代话语植根于西方的文化土壤。

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性国家,现代转型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发生的。其实,中国本土的现代性、前现代性、后现代性的特征杂糅在一起,很难分辨出明晰的现代、后现代特征。日本学者竹内好说:“东方的现代,是欧洲强加的产物,或者说是从结果推导出来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因为现代是一段历史时期,所以不从历史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就会造成混乱。”^③后现代主义概念在西方 20 世纪 30 年代早已有之,到了 60 年代在文学界安营扎寨,尔后又占据了艺术学、建筑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作为一股思潮在西方形成了浩大的声势。中国直接接触后现代思潮是在新时期之后,詹明信于 1985 年在北京大学为期 4 个月的著名的演讲,加之伊哈布·哈桑、佛克马等人著作的影响,在 20 世纪的 90 年代,才将后现代话语真正引入中国文学研究中,形成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

后现代话语与西方的文化语境有关,是为了解决西方现代文化困境而产生的,符合西方文论话语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按照詹明信的说法,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症候,与中国的实际状况是不相符合的。而到了 2002 年,詹明信再次来到中国,在上海发表以“现代性的幽灵”为题演讲的时候,被中国学者认为“终于占到了第一世界的立场”,而遭受了质疑,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争论。在这场争论中,王岳川、陆扬、张旭东等学者在争论中也暴露出对于现代、后现代这些概念理解不同的问题。因此,将这些现代、后现代研究成果简单移植过来,难免有水土不服的问题。

①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桥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440 页。

② 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9 页。

③ 竹内好:《何谓现代——就日本和中国而言》,张京媛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4 页。